

# The Research on Policy Supplies System of Regional Culture Resources Industrial Production from the Angle of View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sup>\*</sup>

——Take the Xuzhou Han Culture Resources as an Example

Jincheng Zhu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Email: poriot88@yahoo.com

Received: Nov. 19th, 2011; revised: Dec. 3rd, 2011; accepted: Dec. 18th, 2011

**Abstract:** Jiangsu has rich and fine historical culture resources which are one of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s that the advantageous culture resources which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cultural capital, as represented by Xuzhou Han culture resources especially.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the related policy supplies system through the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Han culture resources, which will be helpful in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Han culture resources and be goo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resources.

**Keyword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Regional Culture Resources; Han Culture Resources; Policy Supply

##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研究<sup>\*</sup>

——以徐州汉文化资源为例

朱锦程

徐州师范大学, 徐州

Email: poriot88@yahoo.com

收稿日期: 2011年11月19日; 修回日期: 2011年12月3日; 录用日期: 2011年12月18日

**摘要:** 江苏拥有丰富、优良的历史文化资源, 这是优势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产业基础之一, 其中尤以徐州市汉文化资源为代表。本文认为, 充分利用汉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资源优势, 建立相关的政策供给体系, 有助于汉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 并且为区域性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历史制度主义; 区域文化资源; 汉文化资源; 政策供给

### 1. 问题的提出

<sup>\*</sup>基金资助: 本文为2010年度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徐州市文化产业的优势历史资源研究(10YB16)”; 徐州师范大学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研究”(10XWA17)研究成果之一。

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是近年来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领域新兴起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资源产业化的路径研究、产业化策略、发展方略和研究综述等方面(王永章, 2008; 任志明, 2008; 唐金培, 2010; 姚伟军, 2010), 学界对于文化

资源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政策缺失或供给不足以及相应的政策供给研究尚有待深入。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江苏苏北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抓住文化产业崛起的契机,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构建新型产业结构体系,是各级政府 and 学界当下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徐州汉文化资源因其完整的汉墓、画像石、汉文化遗址等一系列完整、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而成为整个淮海经济区极具产业化价值的优质文化资源,同时,其具有的稀缺性、独特性和可开发性成为江苏历史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因此,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关注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的构建对于连云港、淮安、宿迁等徐州及其周边江苏广大欠发达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政策保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 2.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与研究议题的价值关联

### 2.1. 政策供给给予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持续推动

“文化资源产业化”是指把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要素,与其他经济充分结合的经济活动,进而催生出文化传媒产业、文化创意、文娱产业、网络产业等新的文化经济现象和产业形态。(严荔,2010)“政策供给”(Policy-supplying)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概念,在本文特指公共政策供给,其主体是政府。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首先是要建立和贯彻“经济游戏规则”。(Stiglitz,1998)因此,政策供给是指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或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有效和失败两种结果。(姜大谦,2009)本文中公共政策范畴的产业化政策供给特指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方面,即政府能够提供文化资源产业化所必需的、有效的产业扶持政策。从管理学视阈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根据美国学者赫斯蒙德夫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态度“正在经历着从放松管制到重新管制的变化”(Hesmonhalgh,2002),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运用管制理论对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提供政策供给。根据学者陈瑾玫的观点,专门针对产业的政策体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水平型产业政策和垂直型产业政策。前者指针对所有产业,即广

义的政策,后者指针对某一产业或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即狭义的产业政策<sup>[1]</sup>。本文涉及的产业政策特指针对文化产业领域资源开发的狭义产业政策。

### 2.2. 历史制度主义与政策供给之间的逻辑建构

历史制度主义,通常是指从各国的历史发展和比较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以及经济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以解释在特定的制度局限下人们的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Peter A. Hall认为,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sup>[2]</sup>。即他主张运用理性选择理论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来解释制度是如何受到历史的影响从而产生制度因循的因果关系。这种制度因循关系的形成是由于制度或政策的执行者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所采取的妥协适当方案。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变化是一种渐进式的变迁,强调在既有制度基础上的创意,反对全面地、理性地设计制度<sup>[3]</sup>。”我们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一阶段的政策方案。就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而言,同样存在着制度框架变迁和“路径依赖”,即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设计新的政策供给体系时,应该既考虑“共时性”的相关要素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政策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新旧政策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设计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时,既要充分吸纳并借鉴该地区现有的资源产业化政策基础,同时还要结合政府新的产业布局 and 整体规划,构建适应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科学、合理政策供给体系,并为区域层面的江苏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体系形成提供政策支撑。

### 2.3.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汉文化资源产业化价值分析

一是,各级政府明确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路径。2009年下半年出台的《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纲领性文件和江苏省重点培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为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发展路径,徐州市政府则将重点培育汉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体系

列入今后该市实现传统粗放型产业结构向现代新型精细型产业结构转变的主要支柱型产业门类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实现汉文化资源向现代文化资本的转化正是上述政府决策规划与产业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sup>[4]</sup>。由此可见,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门类之一汉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将为推动就业和加快经济转型起到显著的作用。

二是,徐州市的汉文化资源相对于周边地区和本地区其他资源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资源,这是形成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根据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中惟一个被证明绝对正确的真理是比较优势原理<sup>[5]</sup>。”汉文化资源恰恰是徐州市在苏北欠发达地区相比较其他区域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特色鲜明的比较优势资源。根据产业经济学的观点,比较优势资源意味着广阔、光明的市场开发前景。以徐州市汉文化景区为例,它由原狮子山楚王陵和汉兵马俑博物馆整合扩建而成,是以汉文化为特色的全国最大的文化资源类主题公园。涵盖了被称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兵马俑和汉画像石,集中展现了以徐州汉文化资源为代表的我国两汉文化精髓,是淮海经济区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两汉遗风最浓郁、产业化程度最高的汉文化资源开发项目,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继承性创新开发的优秀水准。

三是,本地区丰富的高教资源、劳动力资源为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徐州是苏北地区高校、研究机构最为密集和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劳动力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丰富的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产业资源,为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传统的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身体资本”正在被以文化、智力为特色的“人力资本”所取代,而构成“人力资本”的核心就是“文化资本”。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政策体系的主体、功能、协作、监督等方面来看,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应该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内容所组成:政策体系多元主体定位、政策体系政策选择组合、政策体系支撑平台配套以及政策

体系效应评估等。其中政策主体是政策执行的组织机构,政策选择组合决定了政策的各自功能,政策支撑平台扮演了相互协作角色,政策效应评估反馈政策效果,各部分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政策供给体系。

### 3. 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多元主体定位

为了确保政策供给体系能够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政府、社会和相关企业等多元化主体应该明确各自分工与角色定位。在确立政府在政策供给体系中的主导性核心地位的同时,应切实给予社会、企业以相应的补偿性角色身份,避免各个主体出现责任越位或失位的现象。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政府在制度配置方面应尽可能完善,充分考虑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保证产业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操作层面不会出现政策偏差或曲解的情形;社会研究机构则通过政策调研、政策评估等方式为政策制定提供相关的决策咨询;企业通过对政策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失位和不足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以利于政府在今后不断修正、改进政策供给体系。从国外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模式来看,“都强调创新精神、创造才能、技术和产品的新对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等,并为其顺利发展供各种支持。如纽约的《版权法》、《电子盗版禁止法》等一系列版权保护法规,为纽约文化的创意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机制<sup>[6]</sup>。”因此,多元主体定位明晰是产业政策供给体系各主体合作分工的组织基础。

#### 3.1. 政府主导政策供给体系的框架构建

由于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影响,新制度主义重新强调了制度变迁中以往的政策框架对后续的政策建构与实施的影响,主张制度变迁中的政策延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因此,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新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的建构应是对原有相关政策的完善、创新和提升,而不是彻底推翻和重新构建。同时,资源产业化过程也是不断检验已有政策供给体系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阶段,从而为今后政策的完善、更新、改进提供实证层面的依据,最终有助于制度变迁的顺利实现。正如著名文化产业研究专家赫斯蒙德夫指出,“无论是信息社会、娱乐

或体验经济还是基于符号与意义的经济，文化产业确实扮演了促进变迁的角色<sup>[7]</sup>。”根据上面的分析，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应该反映出政府的主导性核心角色，即政府负责策划和实施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并监管相关文化产业企业严格按照政策体系的内容进行运作。我们注意到，就以往的文化产业政策而言，该市并没有针对汉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制定完整政策供给体系，仅有针对不同文化企业扶持所出台零散政策文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滞后性。因此，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在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文化产业的动态变化过程，对已有的政策框架进行修改和完善，使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日趋合理、规范并以合法渠道予以公布实施，从而在公共权力层面树立政策供给体系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政策效力。

### 3.2. 社会参与政策供给体系的决策咨询与评估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社会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的公共领域组织要素之一，它在公共领域具有协助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辅助与补充作用。特别是由于制度变迁所导致的政策供给变化方面(就中国文化市场管理而言，这种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时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转型所带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相应为文化政策、文化产业调整)，尽管政策供给是由政府做出的，但是政策供给的相关内容需要社会给予必要的政策建议；同时，政策供给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新现象需要社会从第三方立场给予科学、客观的评估甚至是政策效应相关信息的权威发布，在社会层面形成政府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对于产业资源的影响力和集聚力。在构建资源产业化政策体系过程中，仅仅依靠政府政策行为远远不够，政府单方面制定政策体系，容易出现政策效果缺失或政策价值偏好。在此情况下，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社会，即社会研究人员、独立评估机构作为政府决策的咨询、评估机构给予相应的政策制定建议。此外，社会研究作为第三方研究、评价机构，可以定期发布相关产业动态报告或产业发展数据指数，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在汉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形成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密切合作尤为重要，这是确保政策供给实现合理性、

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前提和基础。

### 3.3. 企业介入政策供给体系的效果反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策供给体系的变化赋予了企业新的角色定位，即现代新型文化企业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被动的政策接收者。文化企业在新的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确定之后，其产业运行主体应针对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并给予政策制定部门和社会咨询、评估机构做以必要的政策回应和效果反馈，这种政策回应和效果反馈有助于政府和社会的政策制定、评估机构准确获知现有产业政策的缺陷和改进余地，同时促进政府、社会和企业的良性互动，以保障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持续调整、健全和完善。

## 4. 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政策选择组合

产业政策的多元化组合体现了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政策供给由单一的宏观产业政策(文化产业结构政策或文化产业布局政策)拓展为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等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的综合性产业政策供给体系。上述政策供给体系有效的将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从宏观层面的整体布局延伸到某一产业门类的局部干预最终触及到某一文化企业的具体体现。

### 4.1. 文化产业结构政策

一是，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及省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汉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进行合理的布局和调整。特别是抓住国家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江苏省建设“文化强省”的契机，积极帮助汉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有关企业争取省市产业升级、成果转化、科技创新、产品研发、文化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确保地方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二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出台创意性产业开发扶持政策，引导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结构升级调整，从以产品“制造”为主，变为以“智造”为主。通过不断完善和落实鼓励汉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逐步建立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汉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宏观管理

产品“制造”为主体制。三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文化产业规制政策规范和调整市场竞争格局，确保文化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有序性。

#### 4.2. 文化产业组织政策

一是，“抓大做强”政策。即政府出面把分散的文化资源进行重置、整合、优化，形成规模化、体现集聚效应的比较优势资源，凸显文化产业的集群特征和规模相应，提高某类文化资源产业化协作水平和竞争实力。譬如，就汉文化资源而言，可以徐州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和徐州市文化资源开发投资公司等拳头企业为龙头，建立行业主导型优势企业，确立汉文化资源开发的支柱型产业地位。二是，“错位竞争”政策。即在推动优势文化资源产业化规模效应的同时，鼓励中小型、零散型、特色型文化企业走“专、特、精、新”路线开发文化资源，形成“错位竞争”、“优势突出”的良性发展格局。包括专业文化传播公司的特色产品制作，譬如汉代铜制香薰的产业化仿制品复制，既有收藏价值，也有实用价值，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应和品牌声誉。

#### 4.3. 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一是，推行多元化投融资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资源产业化开发，调整投资主体，由政府单一化变为多元化投资主体。同时，加强银行业的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汉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倡导鼓励贷款、投资担保和再担保公司(机构)开发支持汉文化资源开发“走出去”的贷款担保业务品种。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进而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二是，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人才引进奖励基金。以项目投入和政策性投入为主，采取贷款贴息、项目补贴、补充资本金等方式，用于项目启动、企业贷款担保、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对于与全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文化产业门类布局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作用的汉文化景区、沛县汉文化主题公园、丰县汉文化遗址公园、汉文化资源产业链延伸开发、汉文化产品深度开发等重点汉文化资源产业开发项目给予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补贴，项目前期启动经费补助

和项目配套政策定期跟踪、反馈制度。

### 5. 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支撑平台配套

前文提出了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的政策选择组合，文化产业的核心门类在支撑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协作性，在政策选择组合明确后，政府相关部门还应配套相应的政策供给体系支撑平台，以确保产业政策在有效的实施平台上沿着健康、规范的轨道前行。一方面，从以过程为导向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一旦政策供给体系正式确立之后，相关的政策措施在一定时段和一定产业范围内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切忌政策朝令夕改造成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就这一点而言，政策供给体系支撑平台是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得以维系的重要元素，因此，它也是整个产业政策供给体系的运行保障。另一方面，从以结果为导向的政策效应来看，支撑平台的相互协作对于政策体系的各项政策选择能否全面贯彻执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政策供给体系的支撑平台功能不是相对孤立的，而是互为弥补的。

#### 5.1. 建构多元化融资平台

一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直接投资、间接投资、项目融资、兼并收购、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汉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和结构调整功能为相关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保障。二是整合金融资源。在加强信用制度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探索专利权、著作权、设计权、技术入股以及经过评估的汉文化资源产业化项目等多种渠道作为银行信贷抵押的途径和方式。三是探索文化产业创新投资机制。降低汉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创新门槛，用优惠政策和政策扶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到汉文化资源产业开发领域。

#### 5.2. 完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一是研究建立符合国际惯例、能够反映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特色发展和水平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即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区域性文化资源开发指数指标评价体系，形成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滚动调查相结合的统计制度，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时

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为苏北地区乃至淮海经济区广泛的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提供评估依据。二是加强汉文化产品的市场形势跟踪调查，建立产品的监测、预警、预测、统计信息定期发布制度。密切跟踪国内相似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动态，及时反映最新产品市场趋势。定期通过网络、报刊等传媒机构发布年度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报告，为政府决策咨询和学界研究提供可靠数据。三是建立产品要素数据库，为文化资源的产品市场开拓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降低其搜索信息的成本，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创意产品的市场延伸布局和产业链完善的深度研究，为资源产业开发创新与突破提供必要的产业政策指导。

### 5.3. 培育区域文化产品博览交易平台

一是借鉴一线城市的成功经验，积极筹备“淮海经济区文化资源博览会”。充分包装、展示和推介本区域的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成果，建立本区域定期的产业信息交流机制，促进淮海经济区地区间文化企业的合作和交流，加快文化产品的营销和推广力度，形成和巩固淮海经济区以徐州为龙头的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品牌示范作用和产业资源集聚效应。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推动文化资源博览会办展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树立精品化、市场化意识。以打造“检验和促进淮海经济区文化资源发展的平台，推动区域文化走出去的平台，服务本地区文化发展的平台”为基本定位，强化博览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突出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核心产业，催生有实力、有竞争力、有市场前景的规模化文化资源开发企业。三是充分体现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推动展会的机制创新、内容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打造区域性文化资源展会的“龙头品牌”。

### 5.4. 搭建文化资源产业化区域合作平台

一是树立“大市场、大作为”的观念，了解跟踪国家市场信息，利用“文博会”和各种经贸洽谈会等平台，制定本土文化企业和产品的外向推广计划，支持、鼓励文化企业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二是进一步加强淮海经济区文化资源开发的合作与互动，承接上海和苏南、浙江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在文化信息、文化人力资源、产业化运作、文化资源配

置机制、文化产品交流等方面的优势辐射，构建“淮海经济区文化产业都市圈”。以淮海经济区经济合作为平台，与西安唐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杭州宋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以及南京明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形成互动格局，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产业链，形成完善的区域传统文化产业资源开发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展汉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跨区域、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最终推动生产要素的跨地区高效流动和资源的优化整合。

## 6. 区域性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效应评估

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效应评估包括政策效果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是指相关部门对于政策供给的政策制定、实施手段、政策过程和目标效果给予从头至尾的全过程监控和评估，这是评价政策效应的重要方式，也是产业政策供给体系的主要评价机制。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任何完善的产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会由于市场的不断变化而出现需要政策调整的情况，从而保证产业运行持续合理、稳定，这种政策调整的科学依据主要来自于政策供给体系的效应评估。在政策供给体系构建时必须考虑政策目标制定的可行性、政策手段选择的合理性、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性，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产业政策的单一手段——政府直接干预逐步转化为间接引导、多元合作和政策推动等多种政策手段相互组合的政策供给体系。因此，为了确保相关的政策供给体系达到效应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政策供给主体在制定政策供给体系的过程中应给予政策效应的事前评估和预测，从而判断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事后评估则是针对前期的评估预案，比对政策结果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或偏差，分析政策实行中的政策供给缺失或政策不足的情况，并对资源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给予及时的政策目标修正，同时为后续的政策供给确定更合适的政策工具组合与匹配，从而实现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资源开发的效益最大化目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效应评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6.1. 构建政策供给理论模型，为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提供事前评估基础

借助社会第三方研究力量，通过问卷调查、典型

个案分析、小型座谈会等多种方式调研徐州汉文化资源的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总体规模、群体消费现状和市场潜在前景；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等相关理论建立产业政策理论模型，进行资源产业开发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分析的事前评估。这是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效应评估的第一步骤，此环节直接影响到后面的政策目标能否如期完成以及政策执行效果是否出现偏差。以政策供给理论模型为基础，事前评估将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过程、政策结果等诸多政策预期要素纳入到产业政策供给体系中，并细化到不同的政策选择组合中。

## 6.2. 验证政策供给理论模型，为产业政策供给体系提供事后评估方法

运用影响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等量化科学研究方法，以徐州汉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现状为实证调研模本，针对徐州汉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具体行业总体指标(演艺产业化指标、饮食产业化指标、旅游产业化指标、工艺品产业化指标等核心产业门类产出指标)，围绕从业人员指标、产业化规模指标、产出效益指标、技术溢出效应指标等政策供给体系评估的重要产业要素指标进行实证模型分析，针对已有政策供给体系的执行效果和已建构的政策供给理论模型，验证事前调研数据和质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这是产业政策供给体系的核心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是事前评估的验证和改进，另一方面是对后续的政策供给体系和政府决策提供前期的预测依据和决策基础。

## 6.3. 拟定政策效应评估报告，为后续的政策供给体系提供可靠的改进依据

在评估报告中应以具体结论的形式反映出诸多

评估分析结果：现有的政策供给体系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包括正面的推动作用或负面的干预作用；产业发展中亟待政府提供政策供给解决的现实问题；政策供给体系在事前评估中存在的政策缺失或不足而在事后评估中发现有必要充实与完善的政策措施；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导向和国内外文化资源产业发展现状、本地区国民经济产业布局整体规划等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等。上述评估指标数据是对于文化资源产业化政策供给体系的全面评估，既是前期产业过程的阶段评估，更是后续阶段的预测数据和可行性基础。政策效应评估报告应将国家宏观产业政策与区域行业产业环境以及行业具体发展状况相结合，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整体布局的中观产业政策为核心，兼顾国家文化产业领域的宏观产业政策与典型文化企业的内部微观产业政策，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的产业政策供给体系。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陈瑾玫. 中国产业政策效应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
- [2] P. A. Hall, R.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44(5): 936-957.
- [3] 赵晖, 祝灵.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 25(4): 24-29.
- [4] 吕庆华. 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动力机制论略[N]. *光明日报*, 2005-9-14.
- [5] 梁小民. 经济学家不能治国[J]. *读书*, 2003, 7: 96-100.
- [6] 周雅颂等. 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研究综述[J]. *经济论坛*, 2009, 43(6): 3.
- [7] 赫斯蒙德夫. 文化产业[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8.